

全国第八届《三国演义》暨首届三国 文化学术讨论会综述

实 厚

由河南省社科联牵头主办的全国第八届《三国演义》暨首届三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于1993年9月中旬在河南省许昌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和日本的专家学者共60余人,提交论文40余篇。与会代表围绕《三国演义》与三国文化这个议题,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在民主、和谐、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的特点是:文学的《三国演义》研究与史学的三国文化研究相结合;《三国演义》的本体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学术研究与开发三国旅游事业相结合。会议开得十分成功,结出了丰硕之果。现将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综述于次。

一、对世界出现的三国文化热深表赞赏

与会代表对当前《三国演义》研究出现的新局面和在国际范围内出现的三国文化热深表赞赏。谭洛非认为:一个《三国演义》热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而是国际文化交流中值得重视的一个现象。这股三国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它适应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市场、科技激烈竞争的需要,另一方面或谓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这部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深邃丰富

的文化内涵,在现实条件下得到了高扬。三国热主要表现在:(一)《三国演义》畅销不衰,读者众多,在海外广为传播,影响日益扩大;(二)《三国演义》研究领域拓宽,成果丰硕,研究工作已经突破了纯文学的范畴,出现了从军事学、领导学、经营管理学、人才学、人际关系学、社会心理学等角度着眼的“应用研究”成果,形成了多学科、多层次、多方位的研究新格局;(三)各种艺术形式的改编和再创作的兴起;(四)许多地方注重对三国遗迹的保护、修复和开发等等。胡世厚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开始从“左”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认真贯彻了“双百”方针,使得研究工作呈现勃勃生机。特别是1984年4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成立之后,《三国演义》研究在学会的组织和推动下,出现了新的局面,主要表现在:(一)学术交流活动十分活跃,先后召开了八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和五次专题讨论会;(二)研究成果累累,出版专著和论文集30多种,发表论文约千篇;(三)整理出版了《三国演义》的不同版本;(四)形成了一支有500名会员组成的研究队伍;(五)以《三国演义》为题材,进行各种艺术形式的再创作,呈现出

令人欣喜的局面。新时期的《三国演义》研究有三个突出特点：（一）个体研究的深入，表现在对罗贯中的籍贯、生平、思想和作品成书年代、版本、主题、人物形象、艺术价值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新的观点；（二）从文学角度研究扩展到从文化（含应用）角度研究；（三）开辟了《三国演义》学术史的研究。可以预见，未来的《三国演义》研究，将继续升温，将为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加速经济建设，促进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二、对《三国演义》的版本、作者、思想内容有新的认识

张志合说：“关于《三国演义》的版本，一般认为今存最早的是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且定该本为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原著，而明万历、天启年间以后的诸刻本均原于此本。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志传本’可能早于嘉靖本，或认为嘉靖本即成书于明中叶，但因为证据不足，信从者不多。”我“在北京图书馆发现明天启年间印行的黄正甫刊本《通俗演义三国志传》实是一个约早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二十年以上的刻本”。“从版刻印刷、文字校勘诸方面入手，参阅有关史籍、方志著述，找到刻黄正甫刊本早于嘉靖刻本的可靠证据，并将其成出书时间考定在1500年前后”。鉴于黄正甫版本封面和内文均不题为“罗贯中著”或“编次”，因此，我认为“从宋代三国故事的流传到元刊《三国志平话》再到明弘治年间的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三国演义》的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而不应视为罗贯中的个人创作”。

黄华强、靳青万认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尚智、崇智的美德，三国时代及其以后更是如此。“以往的论者，多认为《三国演义》（尤其是毛本）是以宣扬‘忠、孝、仁、

义、礼、信’之类的封建王道人伦为主旨的。对此，我们不敢苟同。其原因在于：该书对‘忠、孝、仁、义、礼、信’这六德，最终都是否定的；其精心编织的表面上宣扬，不过是一种外在的躯壳；剥去这一躯壳，《三国演义》事实上就只剩下了‘智’这一实质性的内核。对‘智’的追求、崇尚和表现是该书的重心，它集中体现了中华古代人民尚智、崇智的美德”。“《三国演义》的确精心运用了许多笔墨来写‘忠、孝、仁、义、礼、信’这些传统的人伦道德，但是，读者一经仔细研读便会发现，事实上其写忠孝则忠孝不存，写仁义则仁义败亡，写礼信则礼信尽失，而最后成功者却恰恰正是被认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非礼无信的曹操、司马氏等”。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几乎全部都是为斗智而设的。作者最为倾注感情的是主角人物诸葛亮，而这一主角人物则被着力刻划为“智”的化身，全书一百二十回，没有一回不是在写斗智，最终的胜利仍然是“智”的胜利。所以，“智”才是《三国演义》的实质性的内核。张志合认为：中国古代小说在明中叶以前是作为俗文学出现，为正统文人所不齿，因而它是在民间口耳相传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最后才由文人加工成书。从这一角度考虑，该书实际上是一部为封建社会的市井细民和下层知识分子写心的历史小说。在为“市井细民”写心方面，《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演义”，而这个“义”正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思想愿望。为下层知识分子即未曾入仕的文人写心，证明《三国演义》“演义”不“演忠”，宣扬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渴望遇到知己之明主以获得施展抱负的机会，同时也表达了“达者兼济天下，不达则独善其身”的人生理想。

有的代表还探讨了《三国演义》内容方面的其它问题。陈辽在《谶纬与《三国演义》》一文中指出：“谶纬可以预测形势发

展，可以预言未来命运”。“在封建社会里，不可能有科学预测学、未来学，人们预测事件。预见未来的意志和愿望，也只有通过谶纬来实现。《三国演义》对此作了生动、形象的揭示”。文章详细分析了黄巾起义、袁术称帝、董卓迁都、曹丕代汉等利用谶纬的情况，认为“《三国演义》对谶纬的描写，不可能如我们分析的那样对谶纬有那么清醒的认识，但《三国演义》作者在迷信、神秘的外衣下，揭示了谶纬中的合理内核，还谶纬以本来面目，这还是极可贵的”。王定瑜指出：“罗贯中以元末明初的赋税情况为基础，结合三国时期的赋税史料，通过《演义》中有关赋税的种种记叙和人物言论，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自己的赋税思想”，就是反对重敛于民，主张轻徭薄赋；反对空劳民力，主张务本节用；反对横行不法，主张统一赋税。这些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然不失其张扬的价值。宋子健指出：曹操、刘备、孙权的名臣武将，各忠其主，从而形成鼎足之势。这除他们各能用人，众人相扶外，还在于文官武将都有清正廉洁、严以律己、团结群下、取信于民的国士之风。从而各能妙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虽争战形势瞬息万变，胜败无常，仍能守固据险，驰骋环宇，割据一方。三国的灭亡，魏亡于司马氏的窃国，蜀、吴亡于朝内奸臣弄权，阉宦预政。他们结党营私，诬陷忠良，贪污受贿，奴役百姓。这些于今仍有借鉴意义。朱海风、张书祥、李慧军认为：“古往今来，卓越的领导者所以能够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无一不是用己、用人、用策、用势的结果。这四者可说是‘王者之道’的精髓，是领导者克敌致胜的关键性因素等。《三国演义》在用己、用人、用策、用势方面为我们提供大量丰富、生动、翔实的素材，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评价曹操有新的观点

对曹操的评论，历来众说纷纭，而这次讨论会上有不少代表从不同角度评价曹操，有不少新见。赵庆元认为：“曹操是位了不起的封建教育家，他虽然没有教育专著，其言论举措却直接影响着古今中外的读者。”

“他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重教育，靠教育出人才，靠教育搞团结，靠教育激发战斗力，靠教育夺取胜利”。“曹操的教育举措，无疑具有历史局限。但不论在小说生成的社会，还是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它都符合现实主体目标的需要，顺应时代的进步要求，充满着奋发昂扬的进取精神”。刘长荣、何兴明认为：灰色，本来是一种独立的色调。灰色应是深谋远虑，审时度势。灰色，又是调和补充的色调，不仅使诸色毫不刺目，还给人以轻松愉快、自然和谐的感觉。《三国演义》把曹操写成灰色人物，并不是诋毁、否定曹操，而是其成功杰作。若从艺术美的角度看，曹操的形象比较真实、自然，很可爱。曹操形象的灰色美，《三国演义》表现得最丰满，也最典型。王光浒认为：“曹操是当时政治军事斗争的强者，在群雄割据、纷繁复杂的斗争中，他立于不败之地，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具备‘奸雄’的特征。一个‘奸’字标志着他与同时英雄的不同特性。因之，‘奸雄’对曹操来说、作者用之，不完全用其贬意，而隐含的主要成分都在赞扬。”马保纪、李全民从美学角度分析曹操的形象，认为曹操“英雄”形象的形成，主要是受《三国志》的影响。《三国志》是一部史传作品，具有文学作品的性质。曹操由历史走上舞台（指脸谱化的戏曲艺术）并作为“白脸奸臣”而家喻户晓，很大程度上是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影响，再加上毛纶、毛宗岗父子的评点，曹操的脸谱化迅速固定，是使曹操成为“奸雄”的重要原因。“曹操的形象，不论作为英雄，抑或是奸雄，都符合真实二字，《三国志》使之成为英雄，符合历史真实，《三国演义》

又使其变成奸雄，则符合艺术真实。从文学角度看，英雄和奸雄尽管有种种不同，但都是成功的艺术形象；从文艺美学方面看，又都是美的，都是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智慧，有效地体现了社会意义”。丘振声认为：“如果说《三国演义》写曹操其它活动，不免褒贬相间，或贬多于褒，那么，对‘官渡之战’中的曹操，则是完全颂扬的，作者放弃了尊刘抑曹的偏见，把曹操写成一个始终驾驭这场战争进程，吸取群众智慧，作出英明决策，最终打败强大对手的英雄形象。”“‘官渡之战’中的曹操，是一个真实可信性格丰满的人物形象。这是古典现实主义的一个成功范例”。然而，“清人毛宗岗在评《三国演义》时，认为曹操在‘官渡之战’中的许多言行，是虚伪的，是‘奸雄’所为，无一点可取之处。这是偏颇的，不公正的。是他的拥刘抑曹的偏见使然”。

有不少代表从应用角度，论述了曹操的谋略、用兵特色、人才观；还有不少代表从史学的角度，论述了曹操的业绩。

四、对以往论者鲜于问津的曹魏集团的颍川谋士有新见

孟聚考察了颍川谋士群体的结构、特征、作用和地位，认为“曹操智囊团的骨干力量是颍川谋士，主要有荀彧、荀攸、郭嘉、戏志才、钟繇、枣祗、辛毗、陈群、杜袭、赵俨等10人之多”。他们“在曹操几十年的征战讨伐中，无论是政治上的大政方针，还是经济上的重要举措，或是军事上的关键决策，都充分显示了颍川士人的战略眼光和决定性作用，说明了颍川谋士群体在曹操智囊团中的骨干作用和核心地位”。杨芷华对曹魏集团的重要谋士荀彧荀攸及其家族进行了细致镇密的考察，认为，《三国演义》所写荀氏家族八人，重点刻划荀彧、荀攸叔侄。荀彧、荀攸生平事迹，详见于正史。而

《三国演义》为了小说创作的需要，对二荀史实进行了某些改写。如写二荀双双投奔曹操，纯粹为了阐发“人贵改图，士贵择主”这一观点，目的也在于强调曹操所以“威镇山东”完全因为“得士者昌”。至于把二荀之死，双双安排成悲剧，让他们相继为“魏公”，“魏王”事亡，目的也完全为了强化“贬曹”的思想倾向。荀彧之死，是一个政治悲剧。荀彧的“汉统”思想根深蒂固，而他“追随曹操二十多年，对曹操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早期的曹操，“能礼贤下士，大有作为。及晚期，曹操日渐专横跋扈，残暴嗜杀，目无汉室”。“因此，在荀彧思想上，已逐渐无法将‘汉统与曹操统一起来。反对董昭议立魏公，是荀彧思想矛盾的重大显示”，致使“荀彧与曹操的矛盾公开化”。但荀彧“跟随曹操这么多年，自己的地位已经很高，与曹操已结成儿女亲家——一言蔽之，已经陷得很深，没有退路。荀彧无法从自身矛盾与困惑中自拔，自绝而亡恐是唯一的解脱。”

五、探讨了三国文化的丰富内容和永恒精神

赵西尧介绍了他们编写《三国文化概览》的宗旨、内容和特色。胡世厚认为：“三国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具有独自的特色和重要地位。所谓“三国文化”，有两个含义：一是指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文化；一是指罗贯中创作的《三国演义》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作品问世后在中国人民的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中产生的文化现象。《三国文化概览》所说的三国文化是指前者，即魏、蜀、吴三国鼎立前后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三国文化，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灿烂辉煌，独具特色，对我国传统文化有着重要影响”。杨建文认为：“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三国演义》小说已经构成一种客观存在的‘三国演义文化’现

象。其流变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原型三国演义文化（三国时期）；2.前导三国演义文化（隋唐宋元时期）；3.本体三国演义文化（元末至明中叶）；4.后续三国演义文化（明中叶至今及未来）。当今，《三国演义》的学术研究，三国人文景观的开发，《三国演义》的被搬上银幕、屏幕和舞台，三国演义文化精神向海外的传播，都属于后续三国演义文化。我们既要继承好前人审视三国演义文化的优秀思想成果，又要抛开种种历史的偏见，而站在历史新时代的高峰上，溯源三国时代精神，考索三国演义文化流变，体察当代世人心态，预测未来社会发展，共创新的‘后续三国演义文化’之大业。”谭洛非指出：三国文化这个概念的提出，“作为独特的文化现象，有自己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有众多的经久不衰的表现载体——文化形态，也有其独特的文化精神”。“三国文化的母体是三国历史，《三国演义》则是三国文化的主体”。《三国演

义》有一种永具魅力的三国精神。这种精神“既体现了三国那个时代的精神，是三国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以至道德、哲学、价值取向的集中表现，同时又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奋斗中形成的理想、道德、意识、行为标准和审美情趣的文化传统。因而能形成一种精神力量，具有历史的永久性和普遍的认同感”。这种三国文化精神主要表现在：第一、建功立业，奋发有为，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进取思想；第二、勇敢机智，文韬武略，不畏困难，不怕牺牲的尚勇崇智精神；第三、彪炳忠义，惩恶扬善的道德价值取向；第四、举贤任能，知人善任，注意协调人际关系的人才观。

讨论会上，有的代表还分析了刘备、关羽等人物形象和其它问题，其中不乏新意，许昌市、新野县的代表介绍了本地的三国遗迹和开发三国旅游事业的情况与设想。会议商定，下次年会，即全国第九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将于1995年在江苏举行。